

[现代思想译丛]
第三辑]

Society under Siege

被围困的社会

[英] 齐格蒙特·鲍曼 (Zygmunt Bauman) 著
郇建立 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致 谢

我深深地感谢约翰·汤普森(John Thompson),他不仅使本书有了现在的书名,而且,本书的完成也受益于他的积极倡议、朋友般的建议和批判性的评论。此外,我要感谢安·博恩(Ann Bone),感谢她以独特的方式给予的理解、支持和照顾。

引 言

社会学是作为一项现代计划而诞生的。像所有其他的现代计划一样,在诞生后的全部(至少是绝大部分)历史中,它接受了孔德三位一体的任务:预测源于科学,行动源于预测(*Savoir pour prévoir, prévoir pour pouvoir*)。社会学的目标是了解它的对象,以便正确地预测它的运动轨迹,并发现能够和应该采取的行动,倘若有人希望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话。有待被了解、被识破并最终被铸造的对象就是“人类现实”。套用马克思的名言说,正是在这种条件下,人类做出了他们的生物和历史选择,而这种条件本身是不能选择的(恰恰由于这种原因,这种条件才被称为“现实”)。恰恰是这种条件的无法选择挑战了社会学的想像力。既然现代实践是一次跨越边界、超越限制的演习,那么,任何抵制人类选择权的事情都是一种冒犯、交战的借口和战斗的号令。

人们需要了解他们的对象,因为这就相当于消除了它的危害。窃取对象的秘密就像窃取朱庇特^①的雷声。一个已知的对象不会

^① 朱庇特(Jupiter)是罗马神话中天神的最高统治者,相当于古希腊神话中的宙斯。他主宰天道和人事沧桑,预言未来,既是雷电霹雳之神,也是罗马的特别保护神。——译者

再进行抵抗；至少，人们会预料到这种抵抗，从而采取必要的防范，抢先消除它的影响。因此，侦察是强迫敌人屈服的必要条件。信息是最好的武器，它越是详尽全面，被剥夺了秘密的敌人也就越能彻底地被解除武装。一旦为人所知，敌人的财产就会变成其债务。

现代科学把自己当作了现代实践的智囊部门，而存在的现实就是它的敌人（这里的现实可以理解为陌生的、不透明的、模糊的，因此是未受干扰的、目前难以管理的行动背景）。在过去的整整两个世纪，社会学努力成为一门科学，为此，它参加了上述角色的扮演，并试图证明它能够那样做。

如果说实践是行动者^①的所作所为，那么，下定决心采取行动的另一个行动者则是其对手，行动者设定的行动目标决定了其对手的某些属性是否重要。倘若行动者没有从事有目的的行动，也就是说，没有设定并追求目标，那么，信息搜集将是没有意义的，实际上也是不可理解的。就社会学而言，这样的—个设定目标并追求之的行动者就是主权国家，而且，社会学把自己当成了主权国家实践的智囊部门。

消除现实的危害，以便使之更宽松、更易于管理、更易于变化，这是现代精神的规定性特征。但是，这样做的权利和能力不仅是现代机构之间相互争夺的目标，也是现代权力斗争的核心。现代国家已经被马克斯·韦伯界定为这样的机构：它要求获得许可的（“合法的”，不可上诉并且不予补偿）强制垄断，换言之，它要求成为有权实施强制性行动的惟一机构，以便迫使现存的事态有别于它过去的状态，也有别于若使之放任自流所继续下

^① 在此，译者把“agent”翻译成了“行动者”，但需要指出的是，“agent”比较强调行动者的能动作用。——译者

去的状态。

如果行动在追求目标时没有考虑其对象的“自然倾向”，那么，它就是强制性的。就感觉敏锐的、类似于行动者的对象而言，行动的强制性意味着对象的意图和偏好是非法的，因为它被视为源于无知和犯罪倾向的动机。强制性行动的“合法性”意味着它的执行机构否认对象具有抵制强制、质疑其理由、用同样方式还击或要求赔偿的权利。这种合法性本身就是强制问题。不管这种强制被应用了多少次，这种合法性，尤其是合法强制的垄断，决不是没有争议的。因此，它在绝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尚未实现的理想状态，是一个未竟的计划，是一次冲锋陷阵的呐喊。这里有行动者，有目标，有决心、资源和实现目标的希望。当然，也有为智囊部门留下的空缺，于是，社会学申请了那一职位。

不管雄心勃勃的国家希望把发现的现实雕塑成什么形式，元目标——任何可以想象得到的目标的可行性状况，必定是某种具有屈从性和可塑性、意欲转变为另一种形式的现实。每一个雕塑家都知道，可塑性不是有待于雕塑的材料特性，而是材料的坚硬程度与雕刻工具的锋利程度的对比关系所具有的特性。雕塑要想获得成功，既依赖于被挑选出来执行规定任务的雕刻工具的力量，又依赖于材料的屈从性；只有具备了有关材料的可靠的知识，才能选择正确的雕刻工具。然而，“雕刻机构”在雕塑社会现实时，却无法具有雕塑家在雕刻室中所能发现的目标的专一性和程序的完整性，即使许多从事这种雕刻任务的现代国家把雕塑家的自由视为一种模式，视为要追求的理想。

人们需要强大的和资源丰富的国家去保护雕塑家在雕刻室中的绝对权威；而国家却不得不保护自己对社会的权威，社会在这里就好比规模扩大的雕塑家的雕刻室。在这种保护任务中，国家

既是仲裁人，又是当事人，它经常发现自己处于闵希豪生男爵^①的境地（也就是说，他不得不用自己的鞋带把自己拖出沼泽），而没有享有雕塑家的自由。在绝大多数时候，许多其他自称是雕塑家的人，都渴望使用雕刻工具把同样的材料雕塑成不同的样式，并强烈要求这样做的权利。因此，国家的主要兴趣是：没收商店里的雕刻工具，并消灭这样的庭院经济。它要求独自生产和使用“合法性强制”的手段，而这种目标被解释为执行首选的现实模型，因为这种模型更理性、更人性或许诺了更多的安全，并因此要优于目前出现的或将来可能出现的替代模型。

以牺牲尚存的模型为代价来执行首选的模型，这总是意味着强制——不是愿意使用强制，就是以使用强制为威胁。但是，所有的暴力都是这样，并且，一旦行为失去了外在的包装，我们就没有办法从“经验上”对它们进行区分。任何区分它们的边界都必定是专断的，因此，每一个独裁者都必然会要求垄断强制手段。强制只有符合独裁者认可的仲裁程序，并被独裁者认可，才算是合法的。任何其他的强制都被视为暴力，而合法强制的首要使命和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根除它，预防它发生——如果它发生了，那么，就打击它。

区分合法的（允许的）强制与非合法的（不允许的）强制的权利是所有权力斗争的首要目标。在这个战场上，鼓吹用不同的模型来改造社会现实的竞争对手最终会相遇并发生冲突。“文明的进程”（正是凭借这个术语，国家的活动有可能为人所知）使这样的战场成为多余的，因为国家划出的合法强制与非合法强制之间的边界受到争议的可能性，不是被缩减到了最小程度，就是在总体上被消除了。

^① 闵希豪生（Baron Münchhausen, 1720—1797）是德国乡绅，曾在德国军队服役，以擅讲故事闻名，根据所述故事编成的书有《闵希豪生男爵的奇遇》、《快活人手册》。——译者

这种暴力在文明的进程中受到了最强烈的反对，它是“元暴力”，其目的是颠覆国家认可的强制的合法性。这种反对几乎百分之百地不能获得成功，因为暴力（也就是说，公然挑战现存的合法性、争取合法性或希望赢得合法性的强制）好像一支铅笔，用它划下的合法与非法的边界不断被修改。

社会学的历史大致上同现代国家的历史联系在一起。就它的大部分时间而言，社会学都在考察国家认可之强制性的元暴力怎样才能具有适应性和免疫力，以及国家之强制性的合法性是怎样通过以下两种手段得以确立的：一是宣扬某种观点以便使国家保护的秩序国际化，二是在日常生活的结构中消除强制。塔尔科特·帕森斯在总结先前的社会学研究时指出，社会学好比是一出每天都上演的戏剧，消除唯意志的行动者所具有的破坏性后果一开始就是其主要目标，而揭开神秘的剧情则是其首要的认知目标。在帕森斯看来，社会学的历史就是不断地给“霍布斯问题”添加更明确、更全面的注释：即反复出现的、常规的、有规则的行为模式怎么会可能出现？具体而言，追求各自利益、显然互不相容的行动者怎么会协调而和平地共处？关于这个主要的社会研究之谜，社会学思想的各种学派之间并没有什么大的分歧。诺尔伯特·埃利亚斯并不赞成帕森斯的宏大综合（grand synthesis），他把先前分散在整个社会互动网络之上的强制的集中视为“文明的进程”的轴心。这种“社会化”进程——换言之，把“社会的意志”（通常以“共同利益”的名称为人所知）铸造成其成员的动机，并采取各种手段来禁止、压制或镇压反对这种铸造的活动——多年来一直是社会学家关注的核心问题，并构成了社会学研究的主体。

在现代性的稳固阶段，合法性争论的最终结果似乎已成定局。只有一个竞争者有可能在现实中获胜，这就是联合起来的新兴的民族和新兴的国家：民族合法化了国家对纪律的要求，而国家则支

持民族整合/同化/镇压的野心。全球被分割成许多民族—国家这样的领域,那些不属于现存领域的地区是正在等着被吞并的“无人区域”。事实上,“主权”和“民族—国家”是同义的。

在奥托·施密特看来,统治者就是决定了例外状态的人。遵循着施密特对主权的看法,乔基欧·阿甘本指出,主权的真正性质与其说是决定法律的权力,不如说是对法律的豁免权^①;恰恰使其臣民丧失法律保护的能力,才使权力变得真正至高无上。我们可以说,“主权”意味着发布“通缉令”的权利。所有的现代国家,不管其政体如何,它真正的臣民是“无价值的生命”,被永久地钉在进入与排斥的模糊边缘上的生命。

在现代政治中,“无价值的生命领域”“逐渐同政治领域相符合”^②。阿甘本指出,“恰恰是因为我们时代的政治逐渐完全转变成了生物政治,它才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了极权政治”。这样的转变解释了“20世纪的议会民主为什么能够如此迅速地转变成极权国家,这个世纪的极权国家为什么能够比较顺利地转变成议会民主,而这在其他时期是不可能的”^③。

如卡尔·马克思在很久以前观察到的,确切地说是在现时代之初就预料到的,统治者的观念很容易成为占统治地位的观念。实践证明,它们也是在社会学家中占统治地位的观念,确切地说,它们统治着社会学家的思想和实践。难怪,埃米尔·涂尔干的“强制性社会事实”的实现必定要受到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的统治者所施加的强制性实践的影响。由于社会学家致力于揭开“社会现实效果”之谜,所以,他们不得不把国家的主权/合法权力当作它

① Cf.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 11.

② 同上,第9页。

③ 同上,第120页和122页。

的充分必要条件。强制性的感觉是竞争者无法接近——更无法称得上——冠军的超级力量所产生的负效应，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说冠军已经灭亡，那似乎绝对是空想。统治的形式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但是，统治的主权及其与国家的息息相关却不是，所有的社会整合和社会再生产都在这里发生，并在这里结束。

然而，如让-皮埃尔·达休所概括的，不可思议的是，所有那些被认为是稳定的和无法逾越的要塞在双重压力下都土崩瓦解了^①：一是自上而下的全球化，二是自下而上的生物多样性，在这里，它很难融入民族—国家的框架里。难怪有人会问，可靠的、长期成功的民族与国家之间的联盟在何种程度上还有效。

在现时代之初，正在消失的神圣帝国的子孙采纳了共和政体，放弃了“在谁的领地，信奉谁的宗教”(cuius regio, eius religio)这一原则，选择了政教分离，并宣称宗教信仰是同政权无关的个人问题；但是，他们不久以后就把国家当作了他们的已婚伴侣，并宣布发扬爱国主义是主权国家的任务，是其臣民的社会义务。如果目前的事情真是这样的话，民族与国家的分离在新时代预示着什么？

当然，分离的传言时断时续地进行着。不管中间判决能否最后生效，分离似乎依旧是一个富有争议的问题。正统的爱国主义似乎始终到处存在着，好像它仅仅是休眠了一段时间，并没有丧失自身的激情和动员力量。最近，我们目睹了这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在美国大地上的觉醒。在恐怖袭击之后，美国人突然发现，国家提供的抵御危险的盾牌并不能保护他们的个人安全，它很容易就被外部世界的长矛刺穿了；并且，他们需要做许许多多的工作才能使它无懈可击，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实现这个梦想。恐怖袭击的爆发

^① Jean-Pierre Dacheux, 'Balcaniser l'Europe?', *Lignes*, Oct. 2001, p. 78.

致使美国人异口同声地支持国家主动派遣职业海军和空军进行恐怖打击,引发他们用相当陈旧的沙文主义式的叫嚣来反对不同的声音。即使这样,人们依旧在猜测,恐怖袭击能否使美国人接受传统的兵役所需要的大规模的自我牺牲,并且,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若没有更加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件和新恐慌的发生,这股爱国主义情绪能够持续多久。在小范围内,爱国主义情绪经常围绕着体育事件发生,而商业机构在重大体育活动中则利用了爱国主义情绪的宣泄,公司也在商业宣传中利用了爱国主义传统。

然而,民族忠诚和团结是一窝蜂式地表现出来的,也就是说,这种行为是大规模拷贝的个体行为,而不是稳定而紧密地交织在一起的共同体的协调行为,或有益于“大于部分之和的整体”结合在一起的行为(而为了这样的整体,每一部分都愿意并准备牺牲自己)。此外,这些表现形式具有狂欢事件的特征。像所有的狂欢一样,它们是积累起来的情绪蒸汽的安全阀,但通常是短期的,几乎不能影响日常生活的进程——如果说有什么影响的话,它们使爱国主义情绪在每天的“日常”追求(包括常规的例行秩序的再生产)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变小。

在日常生活中,民族同国家一样,仅仅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要求忠诚,并希望成为共同体情绪的焦点。共同体的构成随着时间的变化而变化,竞争者之间的作战前线也不断地变化。不管竞争者特定的情绪能够持续多久,它很少是不受限制的,并从来不会保证能持续到完成既定的任务。所有的协定通常都是预先签订的,即使在情绪爆发过程中,人们似乎也不能终止协议。以情感忠诚为基础的经济学类似于理查德·罗蒂的“竞选政治”(campaign politics),而不是“运动政治”(movement politics)。众多的“想象

的”(或假设的,或虚假的^①)共同体在集体或个体构成的忠诚层次中的位置,在作为持续的相对自我封闭的片断的生活中,会从一个事件到另一个事件的过程中上下浮动,或总体上消失。

这种同目前的主题相关的忠诚的持续浮动好比“抢座位游戏”(musical chairs),它更加明显地(或许是不可挽回地)丧失了民族—国家所享有或要求的特权位置。国家从总体上丧失了大部分曾经拥有的各种主权;它经常处于“别无选择”的境地,而不是自由地实施政策选择;它受到了外部力量的攻击,而不是公民民主地表达出来的偏爱。总之,国家不再是可靠的、有利可图的投资场所,它几乎完全失去了这种吸引力。

要不是现代国家要求完整的主权,现代民族主义是不可能出现的,而且,它会伴随着这种要求的失败或取消而化为乌有。如今,这种要求很少反复出现,甚至不会被热情地追求;即便被听到,它听起来更像是鼓舞士气的讲话,是希望恢复灵感的基本力量、重温尘封已久的回忆而进行的一次艰难而并不热心的尝试,而不是决心的宣布,更不必说是行动的号令了。

常会有人说,民族—国家的日益衰弱,尤其是民族和国家之间迫在眉睫的分离,是一个地方现象,它局限于舒适的、富裕的地区,并受到了真实或假定的、完全建立在经济实力或军事优势基础上的社会保障的拖累与欺骗。在其他地区,国家支持的民族建构引起的动荡年代还没有到来。恰恰是现在,在遥远的地方(非“西方的”或没有完全“西方化了的”地方,也就是说,在通往“西方”之路上被中断或推迟的地区),民族主义诞生了,并准备再现“西方”的民族在几个世纪前表现出来的情绪。然而,这个故事并非完全属实,它在许多方面都受到了质疑。

① 参见拙著 *Liquid Modernity* (Polity, 2000) 的第 5 章“Community”。

首先,早期现代国家的文化运动(cultural crusades)同目前的部落战争、大规模屠杀与种族清洗之间的所有相似性,纯粹都是偶然的。或许,它根本不是偶然的,因为用正统的词汇来解释非正统的行动,或者把不熟悉的、本质上不同的现象视为可能无关的、但熟悉的先例的重复,毕竟是一种广为流传、难以挑战的倾向。因此,如果说它不是偶然的,这仍然会产生误解。部落战争在表面上类似于早期的不成熟的欧洲民族主义,但是,它们首先是民族—国家实验破产的鲜明写照。它们是腐烂的产物,部落之花在民族—国家的坟墓上生枝发芽。

民族—国家是渗入了政治组织(polity)的民族的宏伟设想;群体利益也融进了国家利益,并成了它自身难以分辨的一部分。如果说民族的存在取决于没有受到削弱的、强大的国家力量,那么,对民族的热爱最充分地显现在了以下两方面:严格遵守本地的法律,忠诚服务于国家利益。国家会要求其所有公民的绝对忠诚,并践踏所有其他的利益——如果从国家主权完整的视角看问题,它会蔑视“特殊主义”。因此,文化特性、宗教纷争、语言特征或任何其他信仰和偏好分歧都不再重要。最重要的是,它们不应该妨碍对国家的绝对忠诚,这对于它们当中的任何一个都是一样的。如果发生冲突,优先权是明确的,职责对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民族—国家的这种模型似乎依旧是一个“未竟的计划”,即使在民族—国家最繁荣的那些年也不例外。在绝大多数时候,绝大多数民族都是脆弱的联盟,它们不可能完全和平共处。同化的压力和文化运动是所有的民族建构必不可少的伴生物,但是,它们很少实现设想的、以类同性为基础的共同目标。联盟近乎是不稳定的,离心力始终存在,并且,它的永恒从来就没有得到充分的保证。根据恩斯特·勒南的著名说法,民族犹如一个“日常的公民投票”。公民在把“德国性”或“法国性”放在其他价值和忠诚之上时,很少

被认为是热情的和全心全意的。“我们的国家”这种说法——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只是在国内被反复地强化，它没有得到普遍的认可。使民族始终统一在一起的，是主权国家源源不断的力量，这在原则上——即使不是在实践上——不仅是保证共同的保障和福利的惟一力量，也是解决由它们引起的冲突的惟一力量。民族与国家作为当今最大的、最有力、最持久、极其制度化的“共同体与社会”的现代化身（维克托·特纳的说法），二者的联姻在很多情况下，尤其是在求爱期间以及拉长的蜜月期间，是爱的结合（更确切地说，这里的“爱”应该是安东尼·吉登斯的“汇合的爱”[confluent love]，这是由预期的满足所导致的相互吸引）；但是，使它们稳固地结合在一起的与其说是显然反复无常的爱，不如说是相互利用。

新的“想象的共同体”在形成过程中反对国家，反对它的地域性，反对它对主权完整的要求，反对它划分并加强边界以及阻止或打击跨越边界的内在倾向。它们同样使自己处于不受管辖的空间，恰恰在这样的空间中，从日益衰弱的国家手中失去的权力在发挥作用。它们竭力反对国家边界和国家提倡的区域自治权利。下面的事实具有深刻的象征意义：恐怖势力依然向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提出了挑战，它们从不再是民族国家、全球权力流入的真空地带入手展开自己的行动。类似的象征意义是不恰当的反应：它把新出现的全球性暴力错误地当成了利益冲突，从而把“反恐战争”还原为轰炸实际上并不存在的“流氓国家”。

全球化剥夺了国家大量的先前的权力之后，对伴侣双方能从“金钱婚姻”中获得的利益提出了质疑。除了最具有象征意义的独立的认同之外（当然，这种认同也可以通过许多其他方式而获得），想象的共同体能从仅仅由政治要素构成的“海誓山盟”式的婚

姻中得到什么？答案已经变得不如以前明确，当然也不再马上就能找到。“联结”成一个全球性的力量之网也许是可以采取的既有风险、也有前途的措施，因为它提供了更多的发展机遇和更大的发展空间。

在一个流动而临时结合的世界中（用保罗·维利里奥的话说是，它受到了“消失美学”的统治），持久而不可撕毁的协议被隐藏在了制度的密网中，它预示了命运的反复无常，而不是身份的安全感。这适用于所有的联合，因为地方性的、不稳定的协议产生了金钱婚姻，而这种婚姻是脆弱而短命的。然而，正统的国家与民族的联姻由于特殊原因而失去了许多昔日的魅力。

一方面，国家把最主要的功能（如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以及日益增加的社会和生物政治功能）“出售”给了非政治的、“不受调节的”市场力之后，它不再具有强大的动员力量，而正是由于这种力量，民族曾经是在寻求合法性的国家中受欢迎的、实际上不可缺少的产物。精心设置的专业部门发挥了绝大多数国家现存的功能，而这些专业部门不仅是限制进入的，而且还受到了官方秘密行为的保护。因此，大规模征兵及其必然的结果——大众情绪的煽动——显然不会出现。

另一方面，已经弱化了的国家主权和正在削弱的国家权力使民族认同丧失了它在想象的共同体中的特权位置。在此，进一步说明这句话是必要的：首先，国家凭借它的主权和权力，在过去发展了一种“特殊关系”；其次，想象的共同体是各种利益的交汇点，是形成政治力量的场所。就稳定的制度基础而言，民族相对于其竞争对手的优势，如种族或由宗教、语言、文化、地域或社会性别差异交织而成的想象的共同体，已经大大地减少了。

因此，由于种种原因，犹如社会这个长期的对象，社会学发现自己处在了两难境地：它既失去了自然（或自然化）的对象，也失去

了其忠诚的顾客。由于国家放弃了对合法性强制的专有权,也由于国家实施的强制在许多不同的、但在本质上相互竞争的合法性强制中丧失了特权地位(需要指出的是,刚才提到的合法性强制的竞争是在电脑空间和生活政治这两个分离而又互惠互赖的战场上展开的),所以,把“社会”等同于民族—国家就失去了许多过去是不言而喻的证据。事实上,把“社会”等同于任何一套复杂的、或许相连的结构都是这样。倘若设想“社会现实”受到了有形的身体或其虚幻的复制品(如“价值模式”或“文化精神”)的支配与管理,这就需要大幅度地扩展想像力。划出许多独立的“完整的”边界,并证明它的合理性,这超出了人类的想像力。

这是一个拥挤的世界。

关于“客满”这种说法的全部相似性纯粹是偶然的,这是一个受到语法暗示的虚构。你在电影院或音乐厅前面看到这样的—一个通知后,你会知道,此时此地,也就是说,在这个建筑物里,在今天晚上,已经没有任何多余的空间了;你需要作出别的计划,以便确定你要去哪里,怎样度过你的时间。然而,这里“客满的屋子”仅仅是许多地方中的一个小的地方。你看到这样一个通知后,你已经站在了客满的屋子外边。此时,你可以去其他的建筑物;如果你坚持进入你面前这个特定的屋子的话,你应该在其他的时候再来这里。

然而,“拥挤的世界”并不属于这种情况,其原因很简单:因为并没有所谓的“外部”,并没有其他的藏身之地,并没有世外桃源。对于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人都不能自信地把它当作安身之所,随心所欲地使用他的手段,追求他的目标,不考虑其他的因素。这

样的年代已经过去了，它起源于建造中国长城或哈德良长城^①，终结于建造柏林墙。在这个全球化了的小行星上，没有谁能划一个边界，在这个边界之内，他就会感到完全而真正的安全。不管是在现在，还是在人们可以想象到的未来，这样的事情都不存在。每一个能够想象到的场所都在这个世界内部，并注定广为人知，不管它是多么重要。对于这个拥挤的世界，我们都是知情人士和永久居民，我们没有别的去处。

你从内部知道了世界的拥挤。可见，世界的拥挤并不仅仅是另一条信息。你感觉到了拥挤，你每天经历它，并且，不管你做什么或你能做什么，拥挤的经历都不会离开。如果谁试图忘掉它或自负地相信他有足够的力量对付它，那么，灾难将会降临到他的头上。觉醒的代价可能是极其高昂的，就像“9·11”事件给纽约市民带来的冲击。这些美国人相信，“外部”发生的事件，也就是说，在受到很好地保护的边界的另一边发生的事件，不会而且也不可能影响他们的福利；人们能在边界的这一端绘出好运与厄运之间的界限；顶级的反导弹防护将使密封的边界无懈可击。

“全球化”通常被用来解释“拥挤的世界”的非同寻常的经历。伴随着传输速度（即信号引发行动）接近极限——光速，瞬间的因果交替甚至把最远的距离转变成了邻近，并最终取消了因果差别本身。事实上，我们现在都与他人彼此接近。

全球化把速度提高到极限，把距离甚至缩短为行动计算中可忽视的因素，因此，它不可能是昔日的地域扩张。如保罗·维利里奥所言，“我们生活的世界不再基于广袤的空间，而是基于不断地被我们的交通、传输和远程行动（tele-action）能力缩短的临时距

^① 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为罗马皇帝哈德良时期（117—138）所建，是罗马人保卫不列颠省北疆的屏障，西起 Solway Firth，东至 Tyne 河口。——译者

离。”“新的空间是速度—空间，而不再是时间—空间。”^①维利里奥指出，速度不再是手段，而是环境；可能有人会说，速度是一种融入世界的永恒的物质，而正是在这样的世界中，越来越多的行动被作出，并在这种进程中获得了只有这种物质才能使之成为可能（和不可避免）的特性。我们可以说，由接近域限速度的行动带来的最根本的变化，与其说是突然的到达/出现，不如说是迅速的消失（甚至是行动者在行动舞台上的缺失。行动者在场不存在了，出现与消失融为一体）。新的速度不仅使行动成为临时的，实际上是不可阻止的，而且也使行动在本质上是受惩罚的。行动的不受惩罚性表明，它的对象在本质上是极其容易受到攻击的。

这种新情形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后果是，所有的边界都是可以穿过的，因此，所有划出的边界在本质上都是无效的，至少是临时的和可更改的。所有的边界都是脆弱的、不坚固的、有漏洞的。所有的边界都具有易消失性这种新特征：边界在被划出的同时就被擦掉了，留下的只是曾经划过边界的记忆。地理上的非连续性不再重要，因为速度—空间（speed-space）笼罩着全部的地球表面，它把每个地方几乎都变成了同样的速度—距离（speed-distance），使所有的地方都彼此接近。

在两个多世纪以前（1784年），伊曼努尔·康德在他的《从世界公民的角度看世界历史观念》（*Ideen zu einer allgemeinen Geschichte in weltbürgerlicher Absicht*）中对未来世界进行了预言性的设想：“人类通过共同的公民权将实现完美的统一”。康德指出，这将是“大自然的造化”的实现。在康德看来，它从一开始便是大自然的造化：既然我们居住的星球是一个天体，你不能在没有最终

^① Paul Virilio, *Virilio Live: Selected Interviews*, ed. John Armitage (Sage, 2001), pp. 84, 71.